

# 钱锺书《宋诗选注》的诗学困境与“十七年”文学批评

李 松

**内容提要**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学者为了适应国家意识形态的改造，在文学批评的思想原则与学术方法上作了有意识的调整。钱锺书《宋诗选注》出版后，其诗学标准经受了“大跃进”时期青年学者的激烈批判与资深学者的温和肯定。“文革”结束后钱锺书回顾了编纂该书的学术得失与历史心态，反映了顺应潮流与坚守自我的艰难。《宋诗选注》的批评论争如同管中窥豹、一叶知秋，呈现了“十七年”时期的文学政治与编选者文学信念之间的矛盾与纠结。

**关键词** 钱锺书 《宋诗选注》；“十七年”；文学批评

## 引言

钱锺书是20世纪中国学院派学者的典型，他的思想观念的变动体现了时代风气的影响。考察《宋诗选注》的成书过程以及当时的批判言论，可以弄清楚钱锺书受当时哪些批评规范的影响，从而厘清到底哪些观点遵循了当时的批评标准，哪些观点又勉为其难地作了折中的妥协，而了解钱锺书文学批评思想的时代烙印，理解一个学者在被政治扭曲的同时又做了何等个性意义的坚守。

### 一 《宋诗选注》的编撰缘由

钱锺书之所以编撰《宋诗选注》有如下三个缘由：

第一，因文学所所长郑振铎的指示，钱锺书从清华大学调入中国科学院文学所，随后，郑振铎请钱锺书主持科学院选注宋诗的科研工作。钱锺书在《宋诗选注》的序言中写道：“假若没有郑振铎同志的指示，我不会担任这样一项工作。”<sup>①</sup>郑振铎与钱锺书都是宋诗研究大家，二人惺惺相惜，后者的成就直接受益于前者的支持。《宋诗选注》的序言和部分评语曾先后在《文学研究》上发表

过，1958年9月该书出版。遗憾的是，郑振铎当年10月间因公牺牲，没有亲眼看到该书的问世。

第二，郑振铎之所以亲自点将请钱锺书编选宋诗，因为十分倚重他在这方面的造诣。邓绍基回忆说：“郑振铎的‘点将’又是必然的安排。钱先生在1981年接待潘耀明先生访问时，说起当年陈石遗先生对他‘过奖’，陈石遗先生是郑先生的乡前辈，于是郑先生‘就有了一个印象，以为我喜欢宋诗’。说来十分谦虚。但郑先生却曾说过宋诗选注工作非钱锺书莫属的话。他还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五四以来的学问家中，广泛而深切认识并探究宋诗的人寥寥可数，人才难得。郑先生这些话是我间接听到的，但我却亲闻钱先生不止一次说过的话，他说：就对宋诗版本的熟悉程度而言，他不如郑振铎先生。”<sup>②</sup>关于陈衍（陈石遗）对钱锺书的“过奖”与关爱，可以参见陈衍《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一》《石语》等书多处记载，例如：“默存年方弱冠，精英文，诗文尤斐然可观，家学自有渊源也。性强记。喜读余诗，尝寄以近作，遂得其报章云：‘新诗高妙绝跻攀，欲和徒嗟笔力孱。自分不才当被弃，漫因多病颇相关。半年行脚三冬负，万卷撑肠一字艰。那得从公参句法，孤悬灯月订愚顽。’第六句谓余见其多病，劝其多看书少作诗也。”<sup>③</sup>钱基博的好友陈衍劝钱锺书

不学黄仲则的哀愁、苦吟诗风，是因为黄仲则 35 岁即离世，陈衍的规劝可谓“发自衷心的一片苦心”。

第三，钱锺书在诗歌创作上效法宋诗，在研究上对宋诗也有独到理解。钱锺书的同窗好友吴忠匡曾询问过他的学诗过程和对自已诗作的评价，钱锺书回答说：“19 岁始学为韵语，好义山、仲则风华绮丽之体，为才子诗，全恃才华为之，曾刻一小册子。其后游欧洲，涉少陵、遗山之庭，眷怀家国，所作亦往往似之。归国以来，一变旧格，炼意炼格，尤所经意，字字有出处而不尚运典，人遂以宋诗自我。实则予于古今诗家，初无偏嗜，所作亦与为同光体以入西江者迥异。倘于宋贤有几微之处，毋亦曰唯其有之耳。自谓于少陵、东野、柳州、东坡、荆公、山谷、简斋、遗山、仲则诸集，用力较劬，少所作诗，惹人爱怜，今则用思渐细入，运笔稍老到，或者病吾诗一‘紧’字，是亦知言。”<sup>④</sup>从钱锺书的夫子自道可以看出，他对于宋贤诸人“炼意炼格”“用力较劬”，这些深厚造诣为日后的编选工作打下良好的铺垫。

## 二 钱锺书的选诗标准

1955—1957 年间，在郑振铎、何其芳、王伯祥等人的支持下，钱锺书完成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宋诗选注》。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和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晨书瞑写细评论”，足足“饱蠹”两年，涉猎甚广，选材极精。据杨绛介绍，“钱先生作《宋诗选注》时，工作量很大。他没有从选本到选本，而是从各类总集、别集中直接选诗，几乎把宋人集子都看完了”<sup>⑤</sup>。编选《宋诗选注》的同时，钱锺书再度修订他的《宋诗纪事补正》，后者是前者的基础，也是重要的补充。正如王水照所言：“《宋诗纪事》旨在搜集别集以外佚诗和无别集传世的作家作品，因而初具《全宋诗》的性质；钱先生的《宋诗纪事补正》旁搜远绍，出入书海，后出转博转精，实际上做的也是《全宋诗》编纂工作。”<sup>⑥</sup>正是因为在全编撰宋诗的基础上来编选《宋诗选注》，钱锺书所掌握的宋诗文献既广且深。

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序》发表于《文学研究》1957 年第 3 期，这是长篇的宋诗研究论文，具有

独特的文学见解，他阐述了自己制定的六条选诗标准：

押韵的文件不选，学问的展览和典故成语的把戏也不选。大模大样地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选，把前人的词意改头换面而绝无增进的旧货充新也不选；前者号称“优孟衣冠”，一望而知，后者容易蒙混，其实只是另一意义的“优孟衣冠”，所谓“如梨园演剧，装抹日异，细看多是旧人。”有佳句而全篇太不匀称的不选，这真是割爱；当时传颂而现在看不出好处的也不选，这类作品就仿佛走了电的电池，读者的心灵电线也似的跟它们接触，却不能使它们发出旧日的光焰来。

笔者以为钱锺书的宋诗选学观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1）强调诗歌的境界和意趣；（2）反对诗歌成为负载学问与典故的木乃伊；（3）讲究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而非简单的形式模仿；（4）注重诗歌内容与形式整体的完美和谐；（5）讲求诗歌的时代感和情感共通性，从接受与现实影响来审视其当下价值。正如夏承焘评论所云：“如果选宋诗而不以一部《宋诗钞》和一部《宋诗纪事》作材料为满足，那么，就必须认真地在搜辑辨析上做一番功夫，这不是一件容易事。”<sup>⑦</sup>钱锺书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独具艺术的慧眼，抓住了诗歌本身的意趣与艺术形式的独创性价值，以个人诗歌品藻的赏鉴心态，“把客观标准和主观好尚一致起来，不为前人所牵制，‘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这尤非有深厚的艺术修养和独到的见解不可”<sup>⑧</sup>。夏承焘既是诗人也是词学大家，他的评价可谓深知甘苦的中肯之论。

钱锺书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sup>⑨</sup>然而，他在具体的文本赏析中并非简单套用领袖的观点。钱锺书说：“整个说来，宋诗的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sup>⑩</sup>他对苏轼、梅尧臣等人诗歌的评价，恰恰肯定了他们的形象思维。例如，评价苏轼道：“他有风格上的大特色是比喻的丰富、新鲜和贴切。”<sup>⑪</sup>为梅尧臣的《田家》作出如下注解：“这首诗借用两个古人的名句……梅尧臣把他们的话合在一起写农民的贫困，仿佛移花接木似的，产生了一个新的形象。”<sup>⑫</sup>尽管受到当时政治批评观念的约束，但是钱锺书

以严谨的学术良知、渊博的中西学养、通达的睿智卓识，在思想突围中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个人的性情与识见。也正是因为个人批评观念与时代规范之间的抵牾，《宋诗选注》出版之后毁誉交加，莫衷一是。

### 三 国内学界对《宋诗选注》的负面评价

据杨绛记载，1957年春，“大鸣大放”正值高潮，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刚脱稿，他父亲钱基博在华中师范学院任教，整风运动期间向湖北省委主要领导阐述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结果被划为“右派”，不久病重住院。钱锺书赴湖北省亲，在路上写了《赴鄂道中》五首绝句。从其中三首可以了解时代气候与著者心态：

晨书瞑写细评论，诗律伤严敢市恩。  
碧海掣鲸闲此手，祇教疏凿别清浑。

奕棋转烛事多端，饮水差知等暖寒。  
如膜妄心应褪净，夜来无梦过邯郸。

驻车清旷小徘徊，隐隐遥空踞薄雷。  
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鸠忽噤雨将来。

钱锺书诗以明志，幽微心意的传达十分隐晦，本难为外人道也。第一首写编撰的过程和心志。杨绛解释说：“后两首寄寓他对当时情形的感受，前一首专指《宋诗选注》而说，点化杜甫和元好问的名句（‘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据我了解，他自信还有写作之才，却只能从事研究或评论工作，从此不但口‘噤’，而且不兴此念了。”<sup>⑬</sup>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政治意识形态控制的原因，自由创作的思想空间逐步压缩，钱锺书迫于无奈，从卓越多才的作家转型为学院式的学问大家。社会的急剧转型导致了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焦虑与压抑，沈从文也做出了同样的改弦更张的选择。

许景渊知人论世、细揣诗人心境，他解读后两首诗说：“‘反右’之大潮即将到来，山雨欲来，风满高楼，一时人心惴惴，诗中‘脱叶’‘啼鸠’句喻知识分子之心态也。‘邯郸无梦’‘妄膜尽褪’则言先生胸怀高旷，超然物外，妄念全消，自不

致再堕尘劫矣。足征诗人颖悟，见微知著，故能摆脱尘烦，得非所谓机心动心应者乎？”<sup>⑭</sup>钱锺书曾在1986年4月把上述后两首诗写赠给好友吴忠匡，以纪念吴在“反右”运动里的遭遇。吴忠匡解读道：“‘脱叶’二句尤其形象地表示‘放’而将‘收’前夕的知识分子状态。”在时代风潮中，个人命运犹如“脱叶”聚散飘零，何去何从，何以自主？“确如诗中所说，已是妄心全息，不作‘黄粱美梦’，无分别、计度之心。”<sup>⑮</sup>钱锺书明白自己的处境，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谨慎，自觉地通过疏离潮流以自保，其批评观念在政治性与文学性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体现了他的大智若愚与举重若轻。

1958年《宋诗选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此时的中国社会政治热情空前亢进，社会盛行以政治标准取代艺术标准。由于双反运动的推进，以及后来的“插红旗、拔白旗”批判运动，自由讨论的空间被挤压了，学术上的是非往往直接用政治批判的方法来解决。批判浪潮横扫中国高校与科研机构，钱锺书所在的中国科学院自然无法幸免，《宋诗选注》在中国科学院内部遭到了激烈的批判。《光明日报》第六版“文学遗产”专栏发表了钱锺书当时的同事——文学所晚辈学者的文章，他们集中批判了《宋诗选注》的文学观念。总的说来，这些批判性的观点认为，钱锺书文学思想上的问题集中体现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形式主义方面。

文学所青年学者胡念贻认为：“钱先生在主观意图上也是想使在文章里面有一些精辟的见解，也想解决一些问题，也想使读者对宋诗的面貌有一些真正的了解。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观点限制了他，客观上不仅不可能达到这样的一些目的，而且相去还很远。”<sup>⑯</sup>胡念贻的理由是，钱锺书在谈到如下三种“反映方式”的时候，体现了思想上的混乱状态。“三种反映方式”中第一种“方式”是说诗歌里面如实地反映了某一具体历史时代的某一件具体历史事实。第二种“反映方式”指“诗里写的事情在当时并没有发生而且也许不会发生”，是通过诗人想象反映出来的，文章里面举了范成大的《州桥》为例。第三种“反映方式”如“宋末元初有些人的心理是：要是不能抵抗蒙古人的侵略，就希望找个桃花源去隐居，

免得受异族的统治”。文章里面举了萧立之的《送人之常德》为例，这首诗反映了希望真有一个世外桃源。胡念贻认为，首先，这“三种反映方式”列在一起是并不相类的；其次，“怎样反映”的问题也并没有谈清楚，宋诗里面究竟反映了些什么，这问题并没有认真回答。因此，胡念贻的结论是：“在谈到宋诗的思想内容时，钱先生不正面谈这个问题，却去谈‘三种反映方式’和宋诗里面没有反映的东西，这说明什么？这说明钱先生虽然想谈这个问题，但他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在遇到这个问题时，感到无能为力，感到很窘涩，只好把这样一些东西拿出来谈。这已经显得很混乱了。谈的时候对于一些一般的理论问题没有弄清楚，把不同性质的东西列在一起称为‘三种反映方式’，混乱之中又有混乱。这里充分表现了，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想凭借一点唯心主义的东西来解决问题，是会弄得窘态毕露的。”<sup>①</sup>姑且认为钱锺书的“三种反映方式”的归类有失妥当，但是，据此认为他“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想凭借一点唯心主义的东西来解决问题”，似乎太上纲上线，至少是有些牵强。从批评者意图来看，在当时的大批判氛围中，抓住了“唯心主义”这个政治上敏感的哲学问题，十分符合批评导向上的要求。

胡念贻的结论是：第一，“如果说钱先生在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的特点是企图用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不过由于没有真正掌握，弄得思想混乱的话，第二部分的特点却是索性抛开新的观点回到他的旧有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观点的体系中去了”；第二，“尽管钱先生口口声声反对形式主义，实际他的观点是形式主义的观点。反对形式主义，只好把宋诗都‘批判’掉，因为他把宋诗都看作形式主义的了。本来是爱好宋诗，而且选注宋诗，要向读者推荐的，结果却把它否定了，这是多么难于理解的事情，这就是钱先生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所弄出来的结果”<sup>②</sup>。

黄肃秋评论钱锺书《宋诗选注》时认为：“这是目前古典文学选本中的一面白旗，这是钱锺书先生《谈艺录》的超阶级的唯心主义的观点的继续发挥，这是抽掉了作品思想内容专门从诗体演变上来选诗、解诗的形式主义的表现。”黄肃秋的论据是：“钱锺书先生把整个力量都化在对流派的

叙述上，字法句法的探源索隐上去了。而对于十分重要的这些诗产生于什么样社会背景中，反映一个什么思想内容，却是避而不谈”；“钱锺书先生评选作品的标准是形式主义的，没有充分注意到作品的思想内容”；“他所以一再陈述的只有‘艺术形式’；也只有艺术形式，才可以使钱先生在《谈艺录》的基础上再来谈一次‘艺’，进而成为艺术至上主义，这不是很明显的吗？”<sup>③</sup>

黄肃秋认为，正是因为钱锺书文学研究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形式主义思想，他应该选文天祥的诗歌而没有选，他把王安石的在学士院中值班的诗选上了，却不选他的《寄王逢原》和《绝句》。梅尧臣的《村豪》，王禹偁的《感流亡》都没有选。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他放过了南宋遗民的诗。“像谢迭山、郑思肖、林景熙、游古意等人的作品，都充满了高度爱国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精神，但也由于钱先生以艺术标准代替了政治标准，以个人兴趣、爱好代替了党在古典文学方面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方针，因而也就没有给予上述这些伟大诗人以选入的机会。”<sup>④</sup>除此之外，黄肃秋对《宋诗选注》有两处肯定。第一，“《宋诗选注》虽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但编选者把较大的篇幅放在陆游（共选27首）的作品上，对‘江西派’的开山祖师黄庭坚却只选了三首；这还是值得肯定的。”可见，黄肃秋的称赞来自他对爱国主义诗歌的重视。第二，“某些注文花了较大的劳动力，对于‘研究者’还有一定的用处，这也必须加以指出。”<sup>⑤</sup>显然，黄肃秋只是轻描淡写地指出了该书的价值。

周汝昌首先肯定了该书的價值。他说：“序言最大的功劳，恐怕就是大力攻击批判了宋诗的‘以抄书当作诗’的流弊，以扞撻、拆补、剝削、剽窃‘脱换’的形式主义的手法代替创造，使作品远离生活现实。这种批判在个别作家名下的简评里，也是可以看得到的，是全书的一个优点。”<sup>⑥</sup>周汝昌认为该书存在的问题是：第一，“总起来看，正如序言所表现的，全书虽然也谈政治内容，但是谈得很不够，远不如谈艺术来得津津有味、头头是道，结果，还是艺术压倒了政治，实际上还是脱离政治，脱离现实。谈艺术，也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孤立性，结果，歪曲了宋诗的真正面貌和价值。”<sup>⑦</sup>第二，“作注释，大量推荐了不必要的

东西,而给读者对象解决问题、为读者服务的地方并不够(注释中学术性的问题本文暂不涉及),注者替自己所批判的东西起了推波助澜的客观效用,实际上是宣扬这些应当批判掉的东西。……所有这些,都见出贯串在本书中的一条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线路是如何明显。”<sup>24</sup>周汝昌试图通过批判钱锺书的文学思想,达到为整个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建立批评规则的目的。

上述批评者大多系文学系的年轻学者,虽然表面上看,对垒分明,振振有词,他们的观点似乎与钱锺书水火不容,但在态度上还是温和的,以“钱先生”相称,并未将对方视为思想上的敌人;在论证方式上,政治批评观先行,难免先作结论再找论据,强作解人。如果认为这些白纸黑字就完全等同于批判者个人的真实心意,则未免脱离政治语境而有失公允。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这些批判文字带有某种应付、表态的意味,这一点从当事人的一些回忆录可以清楚知道。至于批评者个人背后无法明说的精神困窘,还有待批评史研究进行历史主义的分析。

#### 四 中外学界对《宋诗选注》的正面评价

与国内学界对《宋诗选注》“口诛笔伐”形成对照的是,就在同一时期日本汉学泰斗吉川幸次郎、小川环树对《宋诗选注》的评价很高。据日本学者内山精也介绍,汉学权威小川环树早在1957年,当此书的部分诗人评论和《序》在《文学研究》上选载时,就密切注意并期待全书的出版;1958年此书初版发行后,他随即在《中国文学报》(第10册)上发表书评,给予热情的高度赞扬。小川环树说:“我们以期待的心情迎接此书,我又以其完全没有辜负我们的期待而感到喜悦”;“这是一本从不同于前人的角度出发来对宋诗进行全面观察的书,它的注释和‘简评’都特别出色。这本书的出现,大概宋代文学史很多部分必须改写了”;它“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全部选本中最好的”,因为“这个选本,冲破了选宋诗的重重难关,无论在材料的资取上,甄选的标准上,作家的评鹭上,都足以使读者认识到宋诗的面貌,它的时代反映和艺术表达,它所能为我们今天欣

赏和接受的东西”。他还对未选《正气歌》作出赞同的评价,认为:钱氏发现,文天祥被蒙古军抓捕以前和被捕以后的作诗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的诗是平凡的,被捕后的诗则多有情感沉痛的好作品,会不会钱氏认为《正气歌》虽然沉痛,却还算不上好作品<sup>25</sup>。

如果说身处日本的小川环树无需顾及表达是否政治正确的话,那么,在海峡对岸的胡适则很清楚钱锺书的处境,他也以理解之心作出了公允的评价。胡适从一位香港的朋友手里得到了一本钱锺书的《宋诗选注》,他对胡颂平说:“钱锺书是个年轻有天才的人,我没见过他。你知道吗?”胡适约略翻了一翻,说:“黄山谷的诗只选四首,王荆公、苏东坡的略多一些。我不太爱黄山谷的诗。钱锺书没有用经济史观来解释,听说共产党要清算他了。”过了一天,胡适看了此书后又说:“他是故意选些有关社会问题的诗,不过他的注确实写得不错。还是可以看看的。”<sup>26</sup>一方面胡适深切理解钱锺书的处身之艰难与时势之严苛,另一方面也从学术角度道出了该书的贡献。

与上述1958年《光明日报》第6版“文学遗产”专栏有些火药味的批判形成对照的是,1959年之后关于《宋诗选注》的评价则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其观点明显理性温和许多,更多的是基于理解而同情的肯定评价。国内学术界1959年对《宋诗选注》看法的转折,也与中央高层对于“拔白旗、插红旗”运动看法的分歧及其不同程度的弱化有关。夏承焘的评价是重要的标志性成果,他的看法全面而深刻,某种程度上回应了前面诸人的责难。舒展解释了这一风向逆转的原因:“夏承焘那篇《如何评价〈宋诗选注〉》持论甚公的文章在50年代得以发表,是由于当时有海外学者在喝彩,而海内呢,这本书却正遭到痛打狠批,出现了极大的喜剧性反差;在不好交代的尴尬情况下,何其芳出于补救的好心,请夏先生赶写的。”<sup>27</sup>关于何其芳对于这一批评事件的斡旋,还可以参见王友胜的记载:“刘世德先生见告,他曾受何其芳所长之托,写信给夏承焘先生,邀其撰写平反文章。”<sup>28</sup>夏承焘“受《文学遗产》主编陈翔鹤委托,撰写了不署实名的书评(后征得作者同意,编辑部改用了真名),此即8月2日发表于《光明日报》上的《如何评价〈宋诗选注〉》”<sup>29</sup>。

夏承焘(1900—1986)对钱锺书十分欣赏,认为“此君信不易才”,他的《天风阁学词日记》记载了1928年至1965年的有关学问、交游等事迹,其中可见与钱锺书的交往。如,1958年7月12日载“阅文学研究,钱锺书评钱仲联韩昌黎诗集释,二君博览皆可佩。”<sup>②</sup>夏承焘对钱锺书有惺惺相惜之情,钱锺书很重视夏承焘对他的建议。10月24日载“又谓文学研究所开第五次批判郑振铎学术思想时,即郑飞机失事之日。近将批判钱默存之谈艺录,默存嘱予提意见。”<sup>③</sup>1959年1月7日载“午后看钱默存《宋诗选注》。近日报纸登批判此书文字数篇,予爱其诗评中材料多,此君信不易才。”<sup>④</sup>5月4日载“发钱锺书函,谢其寄《宋诗选注》及诗,附去感近事一诗。”<sup>⑤</sup>此诗即《自京归杭得钱默存示诗感近事奉报一首》,诗中的“后生可爱不可畏,此语今闻足汗颜”高度肯定了钱锺书的才华。在众多的批判言论中,夏承焘的《如何评价〈宋诗选注〉》秉持文学的学术标准,力排众议,给予了切中肯綮的评判:

(一)夏承焘论述了“选诗难,选宋诗更难”的难处,并且提出了选学的要领:“一是宋代诗人和诗作都不少,却不曾有一部完整的《全宋诗》,而宋人的题咏酬酢的作品特别多,散见于笔记、诗话乃至语录、类书里的,往往而是。如果选宋诗而不以一部《宋诗钞》和一部《宋诗纪事》作材料为满足,那么,就必须认真地在搜辑辨识上做一番功夫,这不是一件容易事。二是宋代诗多,诗论也多,论自己的主张、也论别人的得失。后人论宋诗,以其道还施诸其身,抑扬出入,也就特别突出。赞扬宋诗的,以为‘取材广而命意新’(曹学佺),排诋宋诗的,又说‘终宋之代无诗’(陈子龙)。”基于以上两点认识,夏承焘认为:“今天选宋诗,就必须自具一种手眼,把客观标准和主观好尚一致起来,不为前人所牵制,‘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这就非有深厚的艺术修养和独到的见解不可。诗论既多,就好立宗旨,或是反对立宗旨,有所反对就必然有所主张,也就成为一种宗旨,这样,谈宋诗就免不了谈流派,谈师承,而说到流派师承就又不免出此入彼。后人佞宋和非宋的,往往从宗派见解出发。选宋诗,宗派见解是一重大障碍,得大力排除,但也不能完全否定宗派在宋诗的成长过程中多方面的作用,

这就又非有识力和胸襟不可。加之宋诗面目多,内容题材和表现手法的适应变化很复杂,选诗工作既要求有历史主义观点,也要求有一定的艺术鉴赏力,既要贯彻政治第一的标准,也要求选的确是‘诗’,就更其会感到措手不易了。”<sup>⑥</sup>历来选宋诗的本子极少,远远比不上唐诗。但是,他高度肯定:“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的出版,使我们耳目一新,得到很大的满足。这个选本,确实冲破了选宋诗的重重难关。无论在材料的资取上,甄选的标准上,作家的评鹭上,都足以使读者认识到宋诗的面貌,它的时代反映和艺术表达,它所能为我们今天欣赏和接受的东西。而钱先生在这个选本里,也充分地表露了他的一般对于诗的和特别对于宋诗的见解。而这也正是构成一个好的选本的主要因素之一。”<sup>⑦</sup>夏承焘的判断基于事实与逻辑的分析,富有学理性与说服力。

(二)夏承焘从体例上指出了《宋诗选注》的编选目的。他认为,《宋诗选注》属于品藻评衡的制作,而不纯粹是读本;“好的选本实际上是选者的一种创造,好的选本是一个有机体,贯注在中间的是读者自己的识见、议论”。“《宋诗选注》承继了这个好传统,而改变了过去小传和摘句的内容,成为有系统的诗论。翻开这本书,最引人入胜的就是这些议论意趣洋溢的小序了。如果我们找出《宋诗钞》里每一卷前的小序跟它相比,就更令人感到《选注》的作者对这八十位诗人的作品付出了多少涵泳体察的工夫。而从头到尾,又正贯穿着作者对宋诗的看法和取舍的标准。我起初看到黄庭坚只选了三题五首,有点觉得奇怪;读了小序,读了全书序,又读了陈师道、徐俯、陈与义、杨万里诸人的小序和选诗之后,就觉得黄诗只选上这几首近体,是确有选者自己的见解的。”他进一步辩护道:“从艺术手法上说,宋诗的特点是把唐人的各种技巧全都学来,还不算,再加上诗以外的各种文学形式的表现手法。前人说宋人‘以文为诗’,其实何尝只以文为诗,词赋、语录乃至填词的字法句法,宋人也都以之为诗,而用得好的,却总是诗,而不是文、赋、词、语录。但是有镕铸,也有因袭,有好处,也有坏处,《宋诗选注》的序里,已经说得很多,在《选注》里,很注意地选上了各种不同手法的模板,可以供我们欣赏和琢磨,而也有意识地避免

了许多生硬古怪的造作和变本加厉的沿袭。这里,《选注》就使我们学到了两点:一是,如何从宋诗中学习承继前人的技巧;二是,如何运用各式各样的艺术技巧来作反映复杂的现实生活的手段。”<sup>⑧</sup>如果不是本身对宋诗有着精深研究,也不可能有如此深刻之见。夏承焘可谓钱锺书的忘年之交,学术知音。

(三) 针对“拔白旗”的批评者几乎异口同声地指责《宋诗选注》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夏承焘也作了温和的解释:“《宋诗选注》对于明显的形式主义的作家作品,似乎是有意识地特别防备。《选注》托始于柳开,而于江西、江湖的一些‘大家’,都选得很严,并不是没有独见的。当然,如前面所说的黄庭坚的诗选那样,是不是在37卷的‘内外集’中,从内容题材和风格上看,就钱先生的角度来看,更具有代表性,宜于选取的东西,我们不妨保留着商量的余地。可是,选者在这个地方,用自己的选笔对宋诗的不健康的发展提出了应有的批判,是很可贵的。设身处地,选者在选诗中的甘苦必有可言者,体会到这一点,对读者也许不是无益的。这里也正涉及了对一个时代的文学潮流的看法态度问题。但是,选者也并没有忽视历来为人所熟悉所喜爱的作品,北宋朝,选苏轼、王安石最多,南宋朝,选陆游最多,次则范成大、杨万里、陈与义,这就是数百年来大多数人所能同意的,也是我们今天所容易接受的。在选本里,不用说有不少仅仅描写个人生活意境和流连光景的作品。这些诗篇有较高艺术成就,基调也是高朗健康的,是宋诗中存在着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应该知道它,并且欣赏它。”<sup>⑨</sup>夏承焘对钱锺书的“形式主义”批评观,实事求是地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抗辩,令人信服。

(四) 夏承焘基于宋诗的文本分析提出了选学的基本观点。他认为:“出现于今天这个大时代的古典文学选本,无疑的在这两条不同道路方向上,要求基本上有一个正确的取舍,历史主义地、现实主义地处理它,使古代的作家作品能为社会主义文化生活服务。这是选本的政治标准问题,也是选本的灵魂所寄。”他具体列举了该书可圈可点之处:“一般地说,《宋诗选注》的甄录使读者感到一种积极的、向上的、健康的气氛,在作风上也较能清楚地看到不同作者的个性和创造性。其

中不少的诗篇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宋代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鼓励了爱国主义和反抗的精神:向‘弓箭手’的征集和‘雀鼠耗’的制度提出了抗议,给陶者、盐户、织女的痛苦生活作了深刻的描写,对‘黄纸蠲租白纸催’、‘不论天有眼、但管地无皮’的剥削作了有力的讽刺。有些诗篇歌颂了有民族气节的军人和士大夫,诉说了沦陷的遗民的心事。《选注》所选的这些作家,诚然都是地主和统治阶层人物,就他们的阶级和他们的时代说,无疑的在世界观上有极大的限制,他们无法突破这个局限,他们的生活和职业也大多数是必然依靠着统治者的剥削,但是对着那个现实,他们在作品里‘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恩格斯),这一些可珍贵的倾向,在《选注》里已经有相当分量的表现。这是对这个选本值得提出的一点。”<sup>⑩</sup>夏承焘还把《宋诗选注》和闻一多的《唐诗大系》相比照:“《宋诗选注》对我们说来也许是更切近,更容易领受些。古今来大约很少有厘然允当于千万读者之心而全没有缺点的选本吧。如果不是阿其所好,我觉得钱先生的这本《宋诗选注》是一部难得的好书。”<sup>⑪</sup>今天看来,夏承焘从学术标准出发,基于文学事实,实事求是,体现了良好的学风,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文学所同事乔象钟细读《宋诗选注》的艺术分析,肯定了该书并非简单用形式主义所能否定。“在《宋诗选注》的诗人小传中,选注者钱锺书十分注意对诗人艺术特征的分析,其中的《苏轼小传》是最有代表意义的。他认为苏轼的诗在风格上的特色是比喻的丰富、新鲜和贴切,用多方面的描写和衬托的方法,使得被描写的对象的本相毕露。”<sup>⑫</sup>乔象钟坚持艺术分析的美学标准,用鉴赏经验肯定了钱锺书的文学趣味。

除了夏承焘、乔象钟等人以外,党内高层意识形态管理者对《宋诗选注》也十分欣赏,略有批评也无伤大雅。李慎之评价说:“就他的作品而论,出版在六十年代的《宋诗选注》,就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当时,我是头上戴着帽子的右派分子,看到他在注语里偶尔爆发的狂言大语,真是有为他捏一把汗的担心。据乔冠华告诉我,他认为那是那年头唯一可看的有个性的书。”<sup>⑬</sup>据邓绍基回忆:“这部被人称作‘宋诗学中的一部名

著’的书一出版就受到好评，胡乔木同志和周扬同志都有称赞的话，后者是我亲聆的，记得是称赞书中多有见解，文字也漂亮。但好像也说了或许有过于追求文字技巧之嫌的话。”<sup>④</sup>对此，王平凡的回忆也可以予以佐证：“《宋诗选注》出版后，受到乔木同志的称赞，说他选注精当，有独到之处，是一部难得的选本。”<sup>⑤</sup>

今天不少人提出，为什么钱锺书可以逃过“反右”运动一劫，毫发无损。据王平凡记载：“全学部响应中央号召，开展‘拔白旗，插红旗’运动。文学所专家钱锺书、孙楷第、李健吾、杨季康等受到大字报的点名批判。”但是，“对钱锺书、孙楷第、李健吾、杨季康等人的学术批判，只限在古代组、西方组进行。”<sup>⑥</sup>1959年3月6日、11日，文学所召开党内会议，向参加所务会议的人员（副研以上）传达贯彻中宣部领导讲话精神。据王平凡记载，在所务会议上，何其芳说：“这次开所务会议所以请副研以上参加，主要是要求大家写文章，展开辩论的风气，特别是被批评的本所同志，如孙楷第、钱锺书、杨季康、李健吾，都可以写文章。外地的老专家有的说时机不到，所内的同志带头写。”<sup>⑦</sup>从这些事实得知，20世纪50年代末的文学批评表面上气氛紧张，但是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执行者以个人的学术洞见使批判运动的冲击力得以缓冲。

## 五 改革开放时期关于《宋诗选注》的再反思

《宋诗选注》一书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标，以“人民性”为标尺，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意识形态的需要，留下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关于钱锺书对《讲话》的引用，是钱锺书出于衷心服膺，还是无奈的应景？余英时对此有自己的探究。1978年10月下旬，余英时随美国科学院派遣的“汉代研究考察团”到中国内地去作为期一个月的访古，余、钱二人亲切叙谈、切磋过《谈艺录》的考据问题。1979年春天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出一个代表团到美国访问，其中便有钱锺书。余英时负责接待中国客人。钱锺书一下火车很热情地和余英时行“熊抱”礼。余英时回忆道：“我的直觉告诉我，默存先生确是很诚挚

的，这次用不着‘叙旧’，我们真像是‘旧交’了。”余英时在家中宴请代表团一行，晚上送钱锺书返回住处的时候，“已能无所拘束，即兴而谈”。余英时回忆道：“我也问他《宋诗选注》为什么也会受到批判，其中不是引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吗？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大概因为时间不够，但主要恐怕是他不屑于提到当时的批判者。他仅仅说了两点：第一，他引《讲话》中的一段其实只是常识；第二，其中关于各家的小传和介绍，是他很用心写出来的。我告诉他胡适生前也说他的小传和注释写得很精彩。”<sup>⑧</sup>余英时自己的理解是：“我当时隐约地意识到他关于引用《讲话》的解释也许是向我暗示他的人生态度。1957年是‘反右’的一年，他不能不引几句‘语录’作挡箭牌。而他征引的方式也实在轻描淡写到了最大限度。他是一个纯净的读书人，不但半点也没有在政治上‘向上爬’的雅兴，而且避之唯恐不及。这一层是我在二十年前便已看准了的，现在读到他1955年《重九日雨》第二首的最后两句，我更深信不疑了。这两句诗是：‘筋力新来楼懒上，漫言高处不胜寒。’这是他的‘咏怀诗’。”<sup>⑨</sup>余英时无意对《宋诗选注》进行文学评价，以一个历史学家洞幽烛微，他感兴趣的是时代压力与个人承受之间复杂的心曲，而钱锺书的回答以及诗作也坐实了他个人的判断和解释。

1981年4月6日下午，钱锺书接受彦火采访时道出了当时编选的种种甘苦以及事后的释然。“这部选本不很好，由于种种缘因，我以为可选的诗往往不能选进去，而我以为不必选的诗倒选进去了。只有些评论和注解还算有价值。不过，一切这类选本都带些迁就和妥协。”<sup>⑩</sup>1988年钱锺书为香港版《宋诗选注》写了篇序言，进一步坦陈作为选者的进退失据的两难处境：

它当初不够趋时，但终免不了也付出趋时的代价——过时，只能作为那时期的一种文献了。假如文献算得时代风貌和作者思想的镜子，那末这本书比不上现在的清澈明亮的玻璃镜，只仿佛古代模糊暗淡的铜镜，就像圣保罗的名言所谓“镜子里看到的影像是昏暗的。”它既没有鲜明地反映当时学术界的“正确”指导思想，也不爽朗地显露我个人在诗歌里的衷心嗜好。也许这个晦昧朦胧的状

态本身正是某种处境的清楚不过的表现。

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下，我企图识时务守规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聪明，稍微别出心裁。结果就像在两个凳子的间隙里坐了个落空，或宋代常语所谓“半间不架”。<sup>④</sup>

上面所述的“不够趋时”一说，大有深意。正是该书的批评观念“不够”趋时，因而今天看来，仍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同时，也毕竟在某种意义上是“趋时”之作，因而难免成为反映“时代风貌和作者思想的镜子”——犹如“模糊暗淡的铜镜”——“正确”思想和“衷心嗜好”都不十分明朗，反映了政治规训和个人趣味之间的焦虑与纠结。

正是因为曾经编选《宋诗选注》的原因，跨越多个学科的钱锺书后来进入了原中科院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组工作。《宋诗选注》为钱锺书赢得了他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的认可，而这一认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内部的思想批判并未完全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实用主义所垄断。钱锺书说：“我企图识时务守规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聪明，稍微别出心裁。”<sup>⑤</sup>这也许就是20世纪50年代大多数学院派文学研究者的真实心态，而围绕《宋诗选注》展开的文学评价则是反映当时思想状态的一朵浪花。

## 结语

本文以钱锺书《宋诗选注》的编选及其评价为中心，着重探讨钱锺书的编撰缘由和诗学标准，同时介绍1958—1959年间中外学术界对《宋诗选注》的肯定与否定评价，最后在反思中分析钱氏在艺术标准和政治标准之间矛盾挣扎的诗学困境，并且联系“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和文学环境，为当年的批评事件作了更深层的解析。因为《宋诗选注》的编撰在文学所“十七年”的科研工作上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这个学案为钱氏由文学创作走向学术研究的人生转折提供了说明，也揭示了“十七年”文学批评大历史翻腾跌宕的激流。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二十世纪域外文论的本土化研究”(项目编号: 12&ZD166)子课题的阶段成果]

②④邓绍基《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记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前辈学者之间的情谊》，《光明日报》2003年10月15日。

③陈衍《石遗室诗话》，钱仲联编校《陈衍诗论合集》，第48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④⑮⑰⑱李明生编《文化昆仑：钱锺书其人其文》，第47页，第36页，第67页，第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⑤⑥王水照《钱锺书先生与宋诗研究》，《文汇报》2002年4月6日。

⑦⑧③⑤⑥⑦⑧⑨夏承焘《如何评价〈宋诗选注〉》，《光明日报》1959年8月2日。

⑩⑪⑫钱锺书《宋诗选注》，第7页，第10页，第61页，第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⑬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名作欣赏》1992年第2期。

⑭许景渊《从钱锺书先生学诗散记》，牟晓朋、范旭仑编《记钱锺书先生》，第9页，大连出版社1995年版。

⑮⑰⑱胡念贻《评〈宋诗选注序〉》，《光明日报》1958年12月14日。

⑲⑳㉑黄肃秋《清除古典文学选本中的资产阶级观点——评钱锺书先生〈宋诗选注〉》，《光明日报》1958年12月14日。

㉒㉓㉔周汝昌《读〈宋诗选注〉序》，《光明日报》1958年12月28日。

㉕王水照、内山精也《关于〈宋诗选注〉的对话》，《文史知识》1989年第5期。

㉖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20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版。

㉗㉘王友胜《五十年来钱锺书〈宋诗选注〉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文学遗产》2008年第6期。

③①③③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第7册，第689页，第704页，第717页，第741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④⑩乔象钟《关于古典诗歌研究中的艺术分析问题》，《光明日报》1959年10月4日。

④④④⑤王平凡口述，王素蓉记录《文学所早期大事记》，《中国作家》2010年第22期。

④⑥⑦余英时《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学习博览》2010年第7期。

④⑧彦火《钱锺书访问记》，《明报》1981年6月24日。

④⑨⑩钱锺书《模糊的铜镜》，《随笔》1988年第5期。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武汉大学中国文艺评论基地]  
责任编辑：吴子林

①钱锺书《宋诗选注》，第25页，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